



重教兴学

一直以来,重教兴学是丘濬的追求与实践。

孔子一生教学,践行“有教无类”,认为人不受贵贱贫富的限制,人人都可作为施教的对象。丘濬作为儒家弟子,传承了孔子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思想。虽然被誉为“通儒”“大儒”,但丘濬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不是精英教育。例如,丘濬所编写的《世史正纲》《朱子学的》《家礼仪节》等书,在书中用的都是浅近之言,书中道理易晓可行,以使“学生小子”“穷乡浅学之士”等读者也能受用。当时有“天下人诵其文,家有其书”的说法,可见丘濬的影响深入民间。

此外,丘濬初为京官时,深感家乡学子读书的不易,在府城西北隅创办了奇甸书院,后在乡丁母忧时,又建藏书石室。丘濬深知借书之苦,于是将积攒多年、经他本人精选的图书藏于其中,并全部公开,供家乡学子自由借阅。不少海南学子在此阅读书籍,获益匪浅。

丘濬也乐于教导学生,且其中不少成就颇高。如学生蒋冕,和丘濬一样少年聪慧,十五岁便高中广西乡试榜首。丘濬对他寄予厚望,认为他是“台辅之器”。后来蒋冕果然成为内阁首辅。在海南本土先贤中,王佐少年时曾师从丘濬。王佐与丘濬年龄相差八岁,作为直接师承丘濬的弟子,王佐在政术、学问与文学方面,深受丘濬影响。

11

扭转文风

明成化十三年(1477年),编成《续资治通鉴纲目》一书后不久,丘濬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,即国子监的行政长官。在掌管国家最高学府期间,丘濬致力于转变文风。

文风为何重要?在丘濬看来,文章关乎气运的盛衰,善于洞察世界的人往往不看一个地方的吏治,而更专注于看当地的人文风气。丘濬认为,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章类型,治世有治世的文章,乱世也有乱世的文章,文章关乎着世道,也就是常说的“文以载道”。

当时的科举取士,许多考生写文章追求险怪、华而不实。丘濬在主考南京乡试、礼部会试期间,对这种文章痛加斥斥,决不录用。

丘濬认为,文风的歪曲会对科举制度产生冲击,一旦那些受到不正之风影响的科举士子们侥幸踏入官场,会影响国家的平稳运转。于是丘濬常说“作文必主于经,为学必见于用,考古必证于今”,即为学作文应该遵循经典依时务而作,更要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,与之相对应的文风应该是理正气盛、雅正温厚、平易顺畅,而不是奇诡险怪、浮华空疏。

在给国学生讲学时,丘濬也总是反复告诫他们,要抑制追求险怪的文风,恢复周正朴实的文体,做文章应当达意而止,有自然文采就行。丘濬的这些努力对扭转当时的文风、世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文章关系到世道,写文章应该参考经典,更要依据实际情况,这样才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。



12